

期刊·观察

“哪吒现象”背后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/图

累计票房破百亿元,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;世界电影史票房前十中唯一一部非英语作品,世界著名评分网站IMDb收获8.4分,超越《飞屋环游记》等佳作——“高开疯走”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以下简称《哪吒2》),可谓2025年初全球范围内最重磅的文化事件之一。

“是他,是他,就是他,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”在国人心目中并不陌生的哪吒,回归即是顶流。2019年,“魔童”哪吒横空出世,观众第一次见到一个丑丑的、不受人待

见的哪吒。无论戏内戏外,哪吒都扭转了人们对他的偏见。一句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,改写了哪吒的结局,也点燃了大众对国产动画的热情。彼时,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拿下50亿元票房,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史上最高纪录。时隔六年的《哪吒2》,正不断刷新世界影史纪录。

“哪吒”的名字,本身就透露了其异国的出身。按《新周刊》对哪吒的梳理,“哪吒现莲花化身”“三头六臂擎天地”的典型形象,隐

含着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;最初源出古埃及。在埃及创世神话中,太初之水中浮现出一朵莲花,从莲花中走出“神圣之子”;藕和莲花在印度神话中成为宇宙呈现的象征,莲花诞生了古希腊神话中的日出之神。“三头六臂”的形象并不存在于中国的神仙体系中,但在印欧系神话中却比比皆是:有古希腊神话女神赫卡忒、中亚粟特祆神

维施帕卡……

哪吒这样一个起源于国外的神灵,为什么不仅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,还能在不同时代都深受喜爱?《新周刊》的解读是,哪吒传入中国后,顺利实现了“中国化”;可以“降龙”,继而带来“风调雨顺”;可以庇护儿童、祛除病魔,保障水源干净、防止瘟疫;骁勇善战,是法力强大的少年神。

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,哪吒是以“少年神”的形象为人所知的。其“长纓在手,缚住苍龙”的形象,经历了银幕的

重塑——这是《文化纵横》杂志对1979年的《哪吒闹海》到当下两部《哪吒》进行梳理后得出的结论:1979年,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。这年夏天,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《哪吒闹海》,将哪吒重构为“善良的美少年”,且正式将哪吒再造为“反抗的神话”:一个为个人、为民众抗争的少年英雄,一个追求公平、正义的化身;2019年上映的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,囿于其“魔丸转世”身份,在不断质疑“我是谁”中左突右撞,最终完成了身份的和解,成为与“命运”开战的自我解放者;2025年的
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,用“把世界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”的勇气,破除了“成为世界喜欢的样子”的规训。文章认为,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定义了哪吒的反抗精神——他不仅挑战外部压迫,更突破自我认同的桎梏。哪吒形象在银幕上的重塑,不仅展现了中国动画工业的成长,更折射出时代变迁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演进。

有意思的是,饺子导演的两部《哪吒》,与重燃东方神话宇宙的《黑神话:悟空》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。不论是“哪吒”还是“悟空”,他们真正反抗的,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编织的神话网络,以及其背后的霸权秩序。

■文史期刊

梳理“西游故事”的源与流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25年2月号,半月刊

贞观十九年(645年)正月二十五,已经西行取经17年的玄奘携佛经657部回抵长安。他在漫漫长途经历了什么?万历二十年(1592年),百回本小说《西游记》横空出世,给出了神奇而隽永的回答。最新一期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梳理了“西游故事”的源与流。

“西游故事”的源头,在于唐代的玄奘取经。“玄奘取经”是一段真实的历史:公元627年,年仅27岁的玄奘从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出发,前去天竺(印度)求取真经。他出玉门关、穿过八百里流沙、翻越帕米尔高原、通过西突厥控制的草原、渡过恒河后到达摩揭陀国的佛教圣地——那烂陀寺。他在那烂陀寺学习研究五年,辩论无双。最终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。从出发到返回,玄奘西游历时18年,行程2万多公里,见过很多国王、部落头领和高僧,还遇见了不少奇人侠士、笃信宗教者、绿林强盗。他回国后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,叙述了他的旅行经历和见闻,比《西游记》中写的还要复杂和有趣。玄奘的徒弟慧立和尚写了一本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在这本书里,慧立为了夸大师父的业绩,扩大佛教的影响,开始把玄奘取经的事迹涂上一些神秘的宗教色彩。

玄奘取经的故事流传到民间以后,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兴趣对它不断进行“改编”,使得取经故事逐渐演化为市井传奇:宋代,说书人编了一本十七节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,取经的人除玄奘外,多了一个白衣秀士的猴行者,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。一路上,他帮助玄奘打杀了白虎精,斩除了虺龙,收服了深沙神。从这个猴行者身上已经可以看到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影子。从深沙神的身上,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《西游记》中沙和尚的影子;到了金、元



两朝,玄奘取经的故事已被搬上了舞台,金朝艺人演出的脚本中有《唐三藏》,元朝的杂剧中有吴昌龄写的《唐三藏西天取经》。除杂剧外,元代还出现了《西游记平话》。这是民间说书人的底本。从现存的片段“梦斩泾河龙”和“车迟国斗圣”来看,《西游记平话》中人物众多、情节复杂,和后来的《西游记》相当接近;丰饶的艺术土壤最终在吴承恩笔下的《西游记》中成为经典群像:集勇敢善斗、机智多谋、真诚正义于一身的孙悟空;迂腐善良而信仰坚定的唐僧;好色贪嘴、关键时刻却有急智的猪八戒;木讷忠厚却坚韧不拔的沙僧……作者继承六朝志怪传统,吸收唐宋传奇养分,撷取宋元话本精华,辅以非凡想象,满篇神魔、天马行空,殊方绝域,无奇不有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经过几百年的翻刻、评点和传播,“西游故事”所包含的思想变得丰富而复杂。佛家说佛,道家见道,平凡者赞叹其英雄主义,奋斗者肯定其进取精神,使小说兼具理性与人性光辉的同时,也为后代各类创作者提供了经久不衰的中国IP和无尽无竭的源头活水。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,戏曲、影视、动画、游戏,续写、改编、解构、致敬……“七十二变”中衍生出各自的时代表达,“古典”就此成为“今典”。

一位师爷和一本猫谱

《文史天地》2025年2月号,月刊

在漫长的动物驯养历史中,与人类日常最为亲近的莫过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“六畜”,即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鸡、狗。猫不在“六畜”之列,但它凭借“孩子气的脸、好奇的眼神、柔软的皮毛”,成功地融入了人类的生活,成为人类亲密的伴生动物。最新一期《文史天地》杂志,从清代的一本猫谱入手,介绍了中国几千年的猫文化。

我国动物谱录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,相传周穆王有《相马经》,春秋战国时师旷著《禽经》。清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总结期,清代动物谱录编写也进入繁荣时期,编写的范围从家畜扩展到各类陆地海洋动物。猫谱则是玩赏宠物类谱录中的一种,现存三部猫谱都由清代人编著,即孙弥意的《街婢小录》,王初桐的《猫乘》,黄汉的《猫苑》。其中黄汉所著的《猫苑》是文章介绍的主体。

黄汉本是清代县级官府的师爷,浙江永嘉县人。其功名事迹入不了史书,但因为《猫苑》一书,光绪《永嘉县志》上有了《黄汉传》。传中的黄汉,身兼文人与百姓的双重角色,现存的著述有《瓯东补录》《猫苑》和《菴云草堂诗稿》三部,也曾编纂温州地区民谚的著作《瓯谚》。

文章写道,从商周时代开始,古典文献中已经有了猫的记载,但没有以猫为专题的著作。清代嘉庆到咸丰年间,一下子出现了《猫乘》《街婢小录》和《猫苑》三部猫谱著作。其中,黄汉的《猫苑》写于咸丰二年(1852年),比《猫乘》《街婢小录》晚了50多年,但是篇幅最大,体例独特,内容丰富。作者在该书“凡例”中提出八条编纂原则,包括文献搜集范围、文献分类、文献来源和注释、文献书写格式、口述史采录、文献著作权、文献异同、舛讹、疑问的处理和文献增补续刊。可谓编纂思想明确,体系完整,符合文献学的基本原则,体现了黄汉严谨的著述态

度和高超的学识水平。

从中国猫文化史的角度分析,《猫苑》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猫史文献的搜集和辨析论证,以及对清代猫口述史料的采集。黄汉对清朝猫史文献的广泛搜罗最具价值,可谓是对清代猫文化史料的集大成。《猫苑》共引用清代著作59种,占全部引用图书的三分之一,包括官修类书、邸报、刑部案卷、农书、医书、历书、小说、文集等。一些著作已经失传,如赖智堂的《普救败毒汤药方》、王朝清的《雨窗杂录》等著作,一些猫史文献因《猫苑》一书得以流传至今。

口述历史是一种阐述历史的独特方式,偏重对普通民众生活的记录。中国典籍中缺乏对养猫这类生活内容的记载,口述史料可以弥补许多空白。黄汉重视清代口述史料的采集,《猫苑》口述史料约有138条,主要是关于猫的品种、饲养、鉴别、习俗的内容。

文章认为,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期,官方组织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等大型图书,以及御定《广群芳谱》等谱录类著作,促使士大夫阶层崇尚高雅情趣和广博学识,著书立说之风盛行,谱录类著作的数量猛增。黄汉其人其事和《猫苑》的产生正反映了清代历史文化的时代特征。

■博览期刊

打开格“橘”

《博物》2025年2月号,月刊

若说过年期间最有存在感的水果,柑橘系应该很有发言权:从小红袋里剥出来的沃柑,聊天追剧的伴侣砂糖橘,一家人分而食之的柚子,洒扫布置房间时摆放的佛手,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喜爱的脐橙。总之,悉数登场的柑橘一大家子构成了“过年气氛组”。最新一期《博物》杂志,带领读者打开格“橘”,一起来看“柑橘”大家族的家谱。

古书中讲到橘子,用的都是“橘”字。直到近代,因为“橘”字笔画多,有人开始把“橘”误写作“桔”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发布“第二批简化字”,一度把“橘”简化成“桔”,让“桔子”由错字转正。如今在字典里,“桔”便有释义为“橘的俗字”。事实上,“桔”字出现得很早,但它原本只有一个读音“jié”,本意是又直又长的木头,后来指代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汲水的工具——桔槔。故而书面上提及“橘子”,最好还是用“橘”这个写法。

从植物学的角度,所有柑橘都是芸香科植物,称为“柑橘属”。这个类群的作物有一个共同点:富含芳香物质。柑橘的花、叶、果实,都有许多分泌芳香油的腺体。其中,枝叶所含的芳香油主要是柠檬醛,味道苦涩、气味浓烈,能一定程度上防御动物和昆虫的啃咬。花朵的芳香油则有柠檬烯等成分,有抑菌、杀虫作用。人们常常通过蒸馏萃取,从柑橘叶、花中获取香料。比如用酸橙的嫩枝嫩叶提取苦橙精油,用花提取橙花油,为香水、护肤品添香。值得注意的是,柑橘芳香油极易挥发且易燃,而它在果皮中的含量也很高。所以剥柑橘时,不要离明火太近。这些芳香油同时也是有机溶剂,会溶解乳胶、橡胶。柑橘属的叶片形态



在植物学上也很特别,叫“单身复叶”:看上去只是一片叶子,其实却是退化到只有一片小叶的“复叶”结构。有些种类的柑橘叶柄会膨大,例如柚子和橙子,宽大的叶片底部又膨出“小翅膀”。相比多样的果实,柑橘的花显得比较单一:普遍开白色小花,花瓣通常5个,革质,较为肥厚。柑橘花为完全花,一朵花里同时具备雄蕊和雌蕊,为避免自花授粉,雌、雄蕊通常不会同时成熟。

柑橘类植物的原生环境,是喀斯特山体、多石山地、石漠丘陵地带等相对贫瘠的地方。它们要在艰苦环境中设法保护自己珍贵的花、叶。于是很多柑橘属植物枝条上长有坚硬的“枝刺”,既能防食草动物,亦可阻止鸟类栖落、啄食花朵。气味强烈的叶片加上锋利的枝刺,可以说是魔法和物理防御双重“叠甲”,使柑橘的天敌相对其他植物少了很多。人类则利用这一点,将柑橘栽种在家中当篱笆、院墙。今天在华中地区一些传统民居里,依然有栽种枝刺发达的枳来“看家护院”的习俗。

广东省的泼天富贵从何而来

《中国国家地理》2025年2月号,月刊

最新一期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聚焦广东省。

随着广东省2024年的GDP突破14万亿元,广东省成为我国首个GDP跨过“14万亿”的省份。如果将广东视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,那么它的经济总量足以排在世界第12位。广东省的泼天富贵从何而来?

首先,人旺就是财旺。在常住人口、就业人口、流动人口、劳动力人口、出生人口等人口统计数据上,广东造就了多个“全国第一”。这不仅展现了广东省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,也预示着广东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——人口高质量发展期。实则自改革开放以来,伴随经济的腾飞,广东省人口的发展状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3年末,广东省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.27亿人,比第二名山东的1.01亿人多出2583万人,人口规模与日本相当。

其次,地形、气候、水系等自然条件是造就广东省成为中国“首富”的地理基础。华南低山平原自然省(闽粤桂低山平原自然区)主要包括广东、广西两省区的中南部和福建省的东南沿海地区。基本以山地、丘陵为主,东南沿海地区海湾、岛屿众多,海岸线漫长、曲折;气候以暖热湿润为主要特点,形成了长夏无冬和多台风雨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;区域内河流密度较大,河川径流丰富,主要河流有珠江、韩江等,且自然省的范围基本与珠江水系相重合。在华南低山平原自然省中,广东省占据了这一区域相对核心的位置,粤港澳大湾区更是中心的中心。平坦的地形、适宜的气候和密集的水网……

中国地图上的海岸线有个特点:以长江口为界,以北的岸线比较平直,近岸的岛屿少;以南的岸线明显曲折,近岸的岛屿多。平直的海岸多滩涂,曲折的海岸多海湾。海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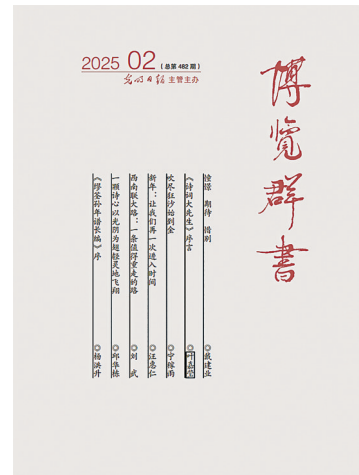


可以看作是海岸线向陆地的凹陷。其中最大的一个曲折,也就是最大一个海湾出现在珠江口,即今日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门等众多城市所在的区域。这个曲折像一个扇形,扇顶在广州,扇缘朝向南方的海洋和海洋中众多的岛屿。地质学揭示了这一曲折的形成过程:在中生代(距今两亿多年)以来,地幔上升,引起地壳张裂、地块断裂下沉,形成巨大凹地,全新世(距今一万年)开始,发生海侵,海水淹入凹地,形成广大的溺湾湾,吸引东江、西江、北江流入。在流入其中的过程中,这三条大江携带的泥沙在这个“大凹地”中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、有独立有交叉的三江三角洲系统,合称为珠江三角洲。粤港澳大湾区即坐落于珠江三角洲。可以说,粤港澳大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,三面环山、一面向海,拥有漫长的海岸线、优良的港口条件和广阔的经济腹地,因而人流、物流与信息流不断在此交织、富集。据统计,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约8600万的人口在5.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创造了近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,跻身世界头部湾区。

■读书期刊

孙昌武其人其学

《博览群书》2025年2月号,月刊



最新一期《博览群书》杂志围绕三十卷、千万字《孙昌武文集》的出版,推出系列文章,推介孙昌武先生其人其学。

孙昌武先生是著名中国文学和佛学专家,著作等身,享誉海内外学术界。1956年,19岁的孙昌武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,以对学术事业的无比崇拜和敬畏准备献身学术事业。但造化弄人,大学毕业后他由北京某高校到营口一个中专学校任职,直到1979年被调回南开大学母校。

不论外部环境如何,孙先生都坚守学术,1982年,他凭借一部《柳宗元传论》在学界崭露头角。本来可以沿着《柳宗元传论》开创的唐代文学研究之路继续走下去,但他却给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和方向——开始向佛教文学研究进军。这样等于白手起家,重新进入一个全新的、难度很高的陌生领域。可他甘愿从零开始,以系统掌握佛教文化知识作为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的起步,最终获得了一系列佛教文学重要研究成果。

文章认为,孙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两大特点:首先表现在始终坚持文学为本位。他善于从宗教层面观察文学现象和文人心迹,这是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精神现象。基于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文化信念,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:“中国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层面,而在于其文化层面。”这个高层建筑的深刻论断不仅准确概括出该书的全部立论基础,更重要的是,它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,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。也就是说,佛教、道教等内容是孙先生切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,是其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诸多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,古代文学才是他始终关注的研究目标;其次,他的很多著作并不一定涉及宗教内容,而是很纯粹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。比如,不少研究者论及古典作家艺术方面只讲几条的原则,如形象性、典型性、结构严谨、语言精练之类。但他认为,这些大的原则的讨论是文学理论范畴的事,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成就,正在于他在实现这些原则上有了自己独特的技巧、方法。